



CDDC计划2007年出书, 稿件征集正在进行中, 欢迎踊跃投稿...

古代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先秦至唐宋

时间: 2002-1-19 22:38:22 来源: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 尹韵公 阅读2850次

报纸诞生于中国, 产生于上古不可记忆之时代。

——伏尔泰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我们的祖先为古代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即四大发明中, 其中有两项与古代的传播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就是造纸和印刷术。根据史料记载和专家研究的认定, 在我们的唐宋时代, 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本文拟从宏观的角度, 综合地考察传播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上古社会的传播现象

从人类学的观点看, 传播是一种本能, 它是人类优于其它物种的突出之处。人类最早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使发出的信息效果更为良好, 方式更为多样, 理解更为容易, 同时还要不断地提高自身摄取和辨认这些信息的能力。实际上,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 人类一直在设法改近其对于周围事物的消息情报的接受能力和吸收能力, 同时又设法提高本身传播消息情报的速度和清晰度, 并使手段和方法不断创新和多样化。

传播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思想和信息的交流, 而这种交流又必须以来于语言和文字。人类早期传播活动的两次飞跃, 就是语言的诞生和文字的出现。

远古时期, 人类群居而立。出于生存和帮助的需要, 人们之间便发明了传递信息的语言。尽管最初的语言, 其地域性和部落性都非常强烈, 并且语言本身也非常简单, 只是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和令人难解的手势, 但在文字出现以前, 语言毕竟是唯一的交流信息工具。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生活经验的积累, 就是靠着这些带有韵味和音节的语言代代相传下去的。必须指出, 自从有了语言, 人们的传播活动, 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深度上, 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潜力, 它可以使思想和信息的交流表达得既详尽又准确。然而人脑的记忆容量毕竟有限, 而且也容易失真, 聪明的人类便开始借助于一些物质材料来帮助记忆和保存有价值的语言。我们的祖先在上古社会首先想到了用绳结来代替语言。如庄子在《籀篇》中说“昔者容成氏, 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鹑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神农氏, 当是时也, 民结绳而用之。”《周易·系辞》上也说“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百官以治, 万民以察。”汉带大学者郑玄在《周易注》里进一步解释道: “古者无文字, 结绳为约。事大, 大结其绳; 事小, 小结其绳。”当然, 绳结文字肯定不是真正的文字, 但是绳结文字肯定又是文字出现以前的必然的过渡之物。没有它的过渡, 声音符号转化为图形符号,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 2000-2002年华人传播学...
- 2000-2002年华人传播学...
- 2001—2002年中国传播...
- 2001—2002年中国传播...

根据史书记载，中国文字的发明应归功于一个叫仓颉的人。大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上古人民把仓颉造字看成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本人也成为真话般的仙者，《春秋·元命》说：“仓颉四目，是谓并明。”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然而，作为一种传播工具，甲骨似乎不是一种理想的材料。当时地处北方的殷代，龟甲产自南方，牛胛骨自属国，均为不易多得之物，而且甲骨表面不平，刻契度藏皆所不便。我国的祖先选中甲骨，也许是看上它的质地坚硬，便于保存，自然地其中也含有一定的迷信成份。据专家们考证，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已有单字近五千个，它既昭示了当时文化的繁荣，表明了传播活动的兴盛。

文字的产生和应用，是传播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使满天飞舞的思想信息有了可供表演的现实场地和具体空间，人们的传播活动从此有牢靠而鉴定的承担者和跨越时间的传递者，从而大大提高了传播功能。只有当语言和文字一道在历史的空间和时间的领域中迈步向前时，传播活动才真正具有了社会意义。当然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字，它本身缺乏一种达于天下的物质力量。要解决这个难题，唯有借助于是交通和驿传。人类的真正历史，是有文字往来的历史。

跟随在甲骨文之后的是仅有三百余年生存史的钟鼎文。钟鼎文亦称金文，盛用在西周王朝的青铜铸器上。青铜器更不是理想的书写工具，但它比甲骨更加坚硬，更能保存长远。在中鼎文时期，单字比甲骨文时期的字数增加。例如，甲骨时期，宀部的字只有家、宅、室、宣、向、安、宝、宿、寝、客、寓、宗等12字，金文却有家、宅、室、宣、向、、宏、康、、定、安、宴、窥、富、实、宝、官、宰、守、宠、宥、宜、宵、宿、、寡、客、寓、、宕、宄、宋、宗等36字^①。以文字结构的发展方向看，甲骨文已超过向性描绘的表现阶段，正值合类比谊的会意阶段，而刚跨入附加音符的形声阶段。金文继承了甲骨文的文字结构的表演手法，但只侧重形声一途，因而金文中形声字大大超过甲骨文。至于联字成句，联句成章，积章成篇，更是甲骨文所望尘莫及。这些都表明了金文时期的传播活动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专家们认为，在殷商时代，从事文字工作的，仅仅只有120人及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商都。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甲骨和钟鼎这两种材料严重地研制了思维和信息的交流和传播。为了突破这些障碍，人们必须在传播材料上另寻出路。

二、观念的自由市场：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蜂起，战乱不已，五霸列位，七国争雄，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传播活动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当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依据各自的立场，著书立说，昌言高放，激越是非，纵论天下大事，形成诸子蜂出的生动活泼局面。他们之间既相互探讨，相互辩驳，广泛地进行信息交流，促进社会变革和文化学术的发展，又形成百家争鸣的观念自由市场的热闹场面。这和当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

在学人们纵谈阔论的同时，精励图治的各国君主和智士阶层都非常重视民意向背和舆论指向。孟子曾答声疾呼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恐怕也是当时的时代呼声。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一篇叫“子产不毁乡校”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段开明人士对公众舆论的态度，所谓乡校，就是乡间的公共场所，供人们聚会议政和交流信息之用。有的官员对此视若大敌，主张毁掉；而另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员则主张保留，认为人心的向背程度是制订政策的依据；还认为，对于人们的舆论和其堵塞，还不如疏通，因势利导，于

国于民有利。这个思想，知道今天，还闪烁着它的光芒。

君主和诸侯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把握民意，了解舆论。据说早在尧舜时代，就设置了供人们议政论事的“进善之旌，诽谤之木。”谤木“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若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当时的诽谤一词，意即指职责缺失，议论是非。所有的交通要道都立有谤木，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谤木刻写及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收集民情的方式，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汉书·食货志》上说：“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木铎和谤木的性质是一样的。当时人们表达政治主张和不满情绪，常常用通过诗歌来抒发，时称“诗言志，歌咏言。”周天子派出的“行人”，又称“轩使，”就是每年到各诸侯国巡视一次，了解政治臧否，征集诗歌民谣，以观政绩。各国君主和政府自己也都设有“采诗之官”，专门研究和注视舆论动态，以次“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②正像《诗·关雎》小序上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因为如此，宋代名相王安石就把《诗经》认为是“断烂朝报”，意即零零碎碎的报纸。后人在研究《诗经》时，只是注意到它的文学意义，而忽略了它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上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朝的轩使是历史上最早的正式从事新闻采访的人。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其中最著名的有十大流派，即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阴阳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纵横家者流、杂家者流、农家者流、小说家者流。自汉代以来的学者们都看不起“小说家者流”，认为这个流派“自无主张，实不得名为一家”。《汉书·艺文志》在解释这个流派的特点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灭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据《汉书·艺文志》介绍，当时十大流派共出书4324篇，其中“小说家者流”就有1380篇，占1/4强。遗憾的是，“小说家者流”的著作，一本也未流传下来，但从这个统计数字上可以想见那时的“街谈巷语”的传播活动，是何等地烈盛！

显然先秦时期舆论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政治上，诸侯证衡，天下汹汹，当时的140多个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着频繁的兼并战争。据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统计，在长达242年的春秋史中，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凡483次，朝聘盟会凡450次，共933次。其中的大国，如楚国先后吞并了45个国家，齐国吞并了10个国家，秦国灭12个国家，晋国灭20余国；较少的鲁吞9国，宋吞6国，等等。到战国时，只剩下秦、楚、齐、韩、魏、燕、赵等七雄和周、宋、卫、中山、鲁等几个小国了。由于各国君主们忙于军事和外交，并且从征服民心 and 顺从民意的立场出发，他们对思想、学术、言论基本上采取撒手不管、放任自流的态度。有时他们还鼓励这种倾向，以显示自己的开明，增强政权的向心力，加上社会上当时还没有出现定于一尊的精神通知，正如《汉书·艺文志》上所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这种政治上多元化的格局，就产生了春秋战国时代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舆论高潮的繁荣景象。

在经济上，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和规模扩大，商品交换的频繁等，也增加了人们的交换机会，提供了传播活动的优良空间。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商品种类的增多和来源的广泛。《荀子》曾说中原城市的市场上，出现了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丹干，东方的织物和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等。当时秦国王宫内的随和宝、明月珠、太阿剑、纤离马、翠凤族、灵色鼓、夜光璧、犀象器，以及江南金锡、西蜀丹青等物，都是来自函谷关外的异国他邦。各国市场上流通着大量的金属货币。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垄断市场的大商人，如孟子所说：“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③商业的中心，往往又是城市的中心。春秋时期，“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在战国时代，“千艾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三里之城，十里之郭”已成普遍，有人估计当时社会总人口已达二千余万。以经济生活最为发达的齐国为例，国都临淄东西约广3公里，南北长4公里；城中有人家7万户，单是青壮年男子就有21万。前人曾形象地赞叹道：“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

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亦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趾高气扬。”④楚国的首都郢城也差不多地“车毂击，人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⑤在这样繁华的城市里，在这样密集的人口中，人们之间必然产生对信息传播的强烈需求。那些来自街谈巷语的小道消息和“细碎之言”，不正是生于斯、长于斯、传于斯吗？

在春秋战国时代，传播媒介的主要承担者是简策。简策出现很早，《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都有“册”字，说明至迟在公元前13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简策。但简策的盛行，却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它的衰落，则是在两汉。《说文解字》竹部释道：“简，牒也。”虫部释道：“牒，札也。”“牍，出版也。”《段氏说文注》云：“简，竹为之；牍，木为之；牒，札其通语也”；又说：“牒之言也，叶也。”一根竹片叫“简”，把许多根简编连到一起就叫“策”（策，通册）；一块木版叫“版”，写了字后叫“牍”；故史称“简策”或“简牍”。

对于简的制作工艺，古书上有详尽的记载。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写道：“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契，折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汉代目录学家刘向在《别录》中说：“新竹有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而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据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先生考证，春秋战国时期的简，最长2尺4寸，其次1尺2寸，又次8寸；两汉时期的简，最长2尺，其次1尺5寸，又次1尺，最短的5寸。长简写经典，短简写传记、杂书。每简只书一行字，简上的字数不等，多则25—30字，少则7—8字。《礼记》上说：“百名以上书于策，百名以下书于版。”可见竹简和版牍各有用途。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祖先是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才确定竹简为传播材料的，并且为了使竹简能够保存久远，在工艺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其困难的程度，不是今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总之，简策的出现，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广泛的社会大步前进。先秦时期的名家名流的著述之多，篇幅之长，远远超过甲骨和钟鼎时期，如屈原诗歌作品总计5000字左右；《老子》史称5000言；孔子《论语》约1600余字；《孟子》7篇约3600余字；《孙子兵法》6000言；韩非作《孤愤》、《五蠹》、《说难》等篇，史称10万言，《春秋》约48000余字，《公羊》、《梁》约45000余字，《左传》高达20万言，巍巍乎为先秦文化发展之大观！假若没有传播媒介的材料变革，就决不可能留下如此丰富的硕果。

当今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们都承认，先秦时期的文人们的著述，其用词之准确，文字之凝练，结构之严谨，容量之丰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后人们所不能望其项背，如孔夫子的《论语》，差不多全是语录集成，可谓字字珠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说是先贤的智商超群，还不如说是他们表达思想的渴望受到传播材料的限制。因为简策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书写工具，它的制作和科协也是相当麻烦的，所以当时的人们在写作上格外慎重，不肯轻易落笔。另外，先秦时期的学术交流固然很多，但沉重的简策给人带来很大的不便。据说，著名学者惠施出外讲学，要带书五车；墨子出外，要带书三车；秦始皇治理朝政时，每天批阅竹简公文达120斤；汉代名士东方朔写了一篇文章送呈汉武帝，竟用了3千根竹简，后由2名壮汉吃里地将文章抬上宫殿。可见，尽管当时舆论思想已经相当成熟和发达，但传播媒介其是跟不上精神领域的需要。

三、萌芽在缓慢省长：从秦汉到魏浸

在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时期中，我们的祖先曾经为古代社会的传播活动作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传播活动不但日趋成熟和发达，而且在技巧上更加细腻，方法上更加多样。譬如，秦汉时期，人们发明了用露布的方法，来公布和传播军事胜利的消息；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修建一连串的烽火台，绵延上千里，以此来迅速地传递敌情动向。又如，魏晋时期，人们

已经学会了组织和调动社会舆论，以此来打击和摧毁敌方的意志。总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古代中国的传播活动既有精采的细节，更有辉煌的篇章。在这里，我们将着重讲述后者。

秦始皇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但是，我们认为，从传播史的角度看，秦始皇当是大歌大颂的人物。他的贡献在于：首先，他实行了“书同文。”许慎在谈到战国时期的汉字时，说：当时“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⑥汉字异体字太多，不统一，不规范，因而严重地妨碍了传播和交流。周宣王时（公元前9世纪），人们曾作过一次努力，进行文字整理，产生了“籀书，”也叫“大篆”，或称“古文”，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断然措施，重新进行文字大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遂产生了以秦国字体为标准的“小篆”，又称“秦篆”。不仅如此，秦始皇还大力推行文字简化改革，于是出现了笔画简省，书写方便，改圆为方的“隶书”字体。正如许慎所说：“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星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故由此绝矣”。⑦《汉书·艺文志》也说：“是时始造隶书，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卫恒在《四体书势》中也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1975年在湖北云梦地区出土的秦简，就全是隶书字体。现代许多语言学家指出：隶书字体的出现，是汉字的一大改革，它为民族统一语的文字的形成，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次，秦始皇实行了“车同轨”，在全国范围内，大修国道。《史记·蒙恬列传》上道：“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汉书·贾山传》也道：“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原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在秦汉时代的大道上，史称：“驿传罗布，车马杂沓，货物转输，络绎相属。”⑧此外，秦始皇还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备的邮传制度，因而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覆盖面。这对以后各个朝代的邮传制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万变不离“秦”宗。

汉代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纸的发明和应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由竹简到纸的演化过程中，其间还有一个转化环节，这就是帛书。帛是丝织品，结实耐用，携带方便，人们很容易想到把它用来写字。春秋时期，齐景公对晏子说：“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七十，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⑨战国时代，帛书似乎比较普遍，《墨子》上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韩非子》也说：“先王治理于竹帛。”陈胜、吴光起义时，曾将数有“陈胜王”三个字的帛书塞进鱼腹，可见帛书当时被认为是贵重物品，一般用于郑重场合。从实际情况看，竹简的应用范围仍比帛书广泛，因为竹简贱，制作比丝帛容易。

现代考古学多次拿出实物证明：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纸就已经出现了。1957年在西安灞桥，发现了西汉武帝时代的古纸；1933年在新疆罗布泊、1978年在陕西扶风均发现了西汉武帝时代的古纸包裹毒药之物；《后汉书》也有类似记载，如公元76年汉章帝命贾逵给学生讲《春秋》、《左转》，赐给他“简、纸、经传各一通；”公元102年和帝立邓皇后为后，命令禁绝万国贡献珍丽之物，只要求“岁时但贡纸莫而已。”现行通行的结论是“纸的发明在公元105年”，其根据为《后汉书·蔡伦传》所记，其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谓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兴平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不管这样说那样说，事实是：纸的发明，对传播工具史和人类文明史来说，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人类的传播活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报纸——邸报开始于汉代⑩其理由是：西汉初兴，汉高祖刘邦实行封建制，大封诸侯国。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同各诸侯国的联系，中央政府允许各诸侯国在京城设“邸”即驻京办事处，这样邸就自然地成为各诸侯国刺探中央政府的情况和动态的情报机构，驻京邸史将这些情报寄回诸侯国，就是“邸报”。吴王刘濞造反之前，十分清楚汉景帝的动态和策略，恐怕这与他派遣的驻京邸史发回的邸报有关系。后来的汉朝统治者接受教

训，采取强干弱枝政策，大大削弱了各诸侯国的地位和权势，这样邸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它再也不是情报机关，因而邸就很快消失了，因为它赖以生存的土壤不见了。

但这并不影响西汉的传播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在汉代，人们已具备了对消息和信息的轻重缓急的处理能力，对消息的内容和类别有了最初的区别认识。譬如，汉代的消息传递分好几个等级，凡注明“以邮行”、“以亭行”的，即是普通文书；注明“吏马驰行”的，即是紧急文书，由专人快马传递；注明“以次传行”的，即系传阅文书，按规定次序和时间传递，不许有误。1972年，在甘肃嘉峪关出土的一块魏晋时期的墓砖上，发现上面刻着一幅画，画的是一个驿使，骑在一匹飞奔的红鬃马上，一手持缰绳，一手举文书，急行传递。它生动地说明当时的人们对信息和传播活动的强烈渴求！

在汉代时代，社会信息量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例如，有关人们衣食住的单字，甲骨文时只有15个，钟鼎文时发展到71个，而到两汉时增加到297个，比当初翻了近20倍，这足以说明随着人们的交流增多，接触面扩大，人们认识事物就更加细致和精确。产生于西汉的许慎的名著《说文解字》一书，共收单字9300多个。

尽管比起简策来，纸张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纸在发明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们仍然是皇宫的珍贵品，简策仍然是社会上主要的书写材料。据说，魏晋初期曾出现过简、帛、纸同时并存的现象，直道西晋时期，纸张依旧是豪贵之家的专用品。当时有的官员做官10年，不书官纸，以示为官之清白；有的人以小纸为书，别人以之骄奢。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练字时，就不敢用纸张，而是用木板或布帛，《晋书·王羲之传》说他先在白色的布帛上练字，用完后将布帛染黑，再制作成衣服。有人曾以西晋的人们争相传抄诗人左思的《三都赋》而一时为之纸贵，以次来证明左思的文章写得如何漂亮，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因为当时的纸张本来就贵，一般平民根本用不起。

纸张从豪贵之家步入平民之室，是经过造纸工艺的变革才换来的。晋室东迁以后，一批有技术的工匠随之而来到长江流域的江南。他们发现这里的气候湿润温暖，各类植物蓬勃生长，他们便开动脑筋，将造纸的原料范围，从两汉时代的麻类植物纤维，扩大到藤、竹以及麦秆等草类植物纤维。这样一来，不但纸张的生产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而且在纸张生产的产量、质量和品种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东晋时的纸张种类，就有了竹纸、马纸、藤纸、草纸、黄麻纸等不同品种。由于纸张原料的丰富和造纸技术的改革，因而加速了纸张取代简和帛的地位，而使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书写材料的过程。公元403年，从东晋王朝手里篡夺政权的桓玄下令废简用纸，最终结束了简的数百年历史，纸张欣然、昂昂然地登上了传播材料的舞台，大显其在传播活动中的伸手不凡。

在两汉、魏晋时期，印刷工业开始了它的最初起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灵帝熹平4年（公元175年）所刻的石经。汉代崇儒，当时官方为避免传误和垂世久远，便把儒家经典著作《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全文刻在一块整石上，历时9年告成，然后立于洛阳鸿都门的国学所在地，供太学生们和儒士们学习。史称“乃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道。”^①久而久之，人们便悟出了一种巧妙的办法，来代替恼人而又不便抄写，这就是有名的捶拓。其过程是：在石经碑面铺上溼湿的纸，轻轻将纸捶打在石面，使之附着紧贴，然后在纸上刷墨。由于石经上的字是凹入的，所以有文字的部分不会是墨。完后即可将纸揭下来，纸上黑白分明，十分清晰。这种省事简便的办法，减轻了人们的抄写负担，提高了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这可以说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魏晋时期，佛教大兴，雕刻艺术盛行，并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据晋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里记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作往之四方数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撇开其中的迷信内容不论，那刻有120字的石头印章，便是其有力的佐证。实际上，当时的雕刻艺术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雕刻材料必须冲破石

头的束缚，以一种等位轻便的材料来代替，否则传播活动的质量将永远停留在石经捶拓的层次上。雕版印刷术，正处于呼之欲出的阶段，正如当代学者邓之诚先生指出的那样：雕版印刷，盖由刻碑变化而来。⁽¹²⁾

四、跃上新高度：唐宋时代

唐宋时代，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及其灿烂、及其辉煌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学术等活动都达到了全盛的顶峰，怪不得当代有的中外学者指出：唐宋时期的中国，处于亚近代化社会的水平。毫无疑问，古代中国社会的传播活动在整個华夏文明走向成熟和发达的过程中，也成熟和发达了传播活动自己。其中，最根本、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报纸诞生了。这有力地说明，古代传播活动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唐太宗李世民统摄天下后，深知江山得之难，而民心得之更难，他郑重地对儿子们说：王朝政府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故而唐贞观8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分遣萧等人“巡省天下，官风俗之得失”。宋太祖赵匡胤夺取政权后，深感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重要性，便设立了全国性的新闻传播中心——都进奏院，史称：“国朝置都进奏院，总天下之邮递，隶门下后省，凡朝廷政事施设、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今播告四方，会通知者，皆有令格条目，见合报事件誉报。”⁽¹³⁾都进奏院的建立，不但畅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皇帝与平民之间的通报和对话渠道，而且还为宋代报纸的出现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商业的繁盛，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的规模扩大，这些都与传播活动的强度、力度、深度、信息覆盖面等紧紧地联在一起。唐代的重要商业与文化的城市有长安、洛阳、扬州、益州、广州、荆州、相州、幽州、汴州、宋州、凉州等，其中最大的是长安和洛阳。长安城规模宏大，建制严密，布局对称，城东西长9550公尺，南北长8470公尺，周围70里，城内列置着108坊，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城内居住着近百万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50左右，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志》上说，长安东市有220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商业区内甚至还出现了出售专门性商品的店肆。不过，唐代的长安城内，坊巷只是住宅区，黄昏后坊门紧闭，禁止夜行，商定都集中在市里，所有的交易只能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享受白天的阳光。而在宋代的城市，就突破了坊与市的界限，不但街巷随处可见上铺邸店、酒楼饭馆，而且热闹的夜市也出现了，打破了夜间不得交易的传统习惯。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不朽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而细致地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社会生活。那熙攘的人群，林立的商店；那热闹的交流，众多的广告，令人想见宋代的社会生活是何等的纷纭，它的信息传播活动又是何等的兴旺。据粗略统计，宋代拥有20万人口的城市多达6个，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更是一座拥有30余万户、百余万人口的商业性消费大城市，其商业税占国家总税收的1/7。⁽¹⁴⁾

自唐以来的科举制，又从另一个方面对古代传播活动产生了积极而有益的影响。科举制的出现，方便和加强了各地文人之间在感情上、思想上、学术上、专业上的交流和传播，同时，它又极大刺激了纸张的生产和印刷工具的进步。科举制对传播活动的刺激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由于魏晋时期人们解决了纸张生产的原料问题，因而使纸张生产的产量大幅度上升，所以到了唐宋时代，纸张已不再是贵重物和奢侈品，并且纸张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应用非常普及。唐代时，人们就用纸张糊窗户、糊灯笼、制作风筝等物，还用纸张做记帐本，这表明至少在唐代时，纸张的产量已能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唐代以前的纸张生产没有一定的规格，尺寸漫无限制。自唐以后，出现了“尺纸”、“寸纸”、“匹纸”、“片纸”等不同规格的纸张，反映了生产工艺上的改革和进步。在纸张品种上也有了可喜的变化，其中至今闻名的“宣纸”，就是唐代的产物。宣纸产于安徽泾县，唐代称宣州府，故而得名，它是公认的书法和绘画的上等佳品。据《新唐书·地理志》和《通典·食货志》上记载，唐代的常州、杭

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汀州、池州、信州、衡州、益州、韶州、蒲州、巨鹿等地，均是全国产纸张和贡纸的地方。宋代的造纸工业，较之唐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王朝中央政府设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造纸工场，内有技术工人1200人。据《蜀城谱》记载，当时仅成都一座就有数百户以造纸为业的人家，有的个体作坊占有几十名造纸工人。生产宫廷专用的贡纸之地，唐代只有二处，而宋代扩大到8处。贡纸生产尚且如此，一般纸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的提高，就等不消说了。

从石经捶拓过渡而来的雕版印刷是唐代社会给与传播活动和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雕版印刷的原理同石经捶拓一样，所不同的是将石版换成了木板。当然，在木板上雕刻比在石版上雕刻要快得多、方便得多，有利于加速传播活动的效益。有人认为，雕版印刷隋代已有。而我觉得，隋代短命，可能正在发明过程之中，真正完成这项发明并广泛应用于实际生活之中的，还是在唐代。唐代诗人元稹于唐长庆4年（公元824年）为诗友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说：“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20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烂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是盗窃名胜，苟求是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又说：“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诗，卖于市肆之中也。”^⑤所谓模勒，就是刊刻、印刷出版。白居易的诗作，那么多人吟唱，不能不跟作为传播媒介的出版物——书记有很大的关系。唐朝东川节度使冯宿曾上奏道：“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⑥唐文宗大和9年（公元835年）12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版。”^⑦从这些史料记载来看，当时雕印的印刷品已相当广泛；由于人们掌握了这项技术，上层统治阶级要想实行文化垄断和文化封锁，已再也不可能。现在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是于1969年在南朝鲜发现的汉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据称是唐武后长安4年至唐玄宗天宝10年（公元704至751年）间的印刷品。它比举世公认的最早印刷品即王介印造的《金刚经》（公元868年）要提早120年。过去有的专家根据《金刚经》的画和字的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墨色匀称、根据熟练、成像清晰而推断《金刚经》绝非最早的印刷品，现在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人们并不想长久地滞留在雕版印刷阶段，因为在它身上，也残存着难以忍受的弱点。传播活动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呼唤着更先进的印刷工艺。这样，“活字印刷术”便在宋代应运而生。有人对此也不以为然，说在崇尚科研的宋代，这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当归功于一个普通的平民毕生。著名的宋代科学沈括在《梦溪笔谈》卷18中，对此作了珍贵而详尽的记录：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之。自冯贻王始印五经，后世典籍皆为版本。庆历（宋仁宗年号，公元1041至1048年）中，有布衣毕生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一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持就火炆之。药稍熔，则以一手版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上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毕，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20余印，以备一版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玷污。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之。”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加速了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和增大了社会总知识的积累量，同时也为新闻媒介的印刷报纸创造了必要的技术前提和条件。活字印刷术在世界闻名史、人类思想史和社会进步史上所起到的伟大的推动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宋代人考虑问题很细致。他们不但发明了印刷术，而且还发明了适合印刷字型的宋体字。宋体字的特点是“横轻直重”、“笔法整齐，气味古朴。”^⑧直到现在，我们的一些新闻媒介

如报纸、杂志和出版物还在使用着宋体字。

传播学认为，完备而发达的交通，是进行信息的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条件。唐代帝国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举世无双的交通动脉网络。据统计，唐代全国有驿站1639处，水驿260所，水陆兼备的驿站有69所。每30里置1驿，设驿长1人，各驿站建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陆驿每站置马8至75匹不等；各道的一等驿有马60匹，二、三等驿再各减15匹，四等驿18匹，五等驿12匹，六等驿8匹。马每3匹由1人看管，每匹驿马给地4顷，蒔以苜蓿。⁽¹⁹⁾全国从事驿站的工作人员有5万人左右。唐代的驿传交通是以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东至宋、汴、西至岐州，……难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²⁰⁾唐代的诗人们对当时的交通状况，深为满意。岑参唱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韩愈唱道：“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

宋因唐制，基本上无大变化。不同的是，宋代驿传全部军事化，因而提高了消息传播和情报传递的效率。唐代驿传最快的一天行三百里，而宋代最快的一天可达五百里。当年宋高宗就是靠这种最快的急递铺，连发12道金牌，把名将岳飞从抗金前线召回临安的。

由以上的因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唐宋时代的报纸的出台是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有顺理成章之势。但是，又由于唐朝和宋朝各自据有不同的社会特点，因而报纸的产生也就不同。

唐代社会类似于汉初社会。唐代藩镇割据十分厉害，各地藩镇均在京师长安设有进奏院，即驻京办事处。这种机构的设立，一方面是便于唐中央政权控制和联系各节度使，另一方面又方便了各节度使刺探中央政府的动态和情报。进奏院官吏只对节度使负责，不对中央政府负责，每隔一段时间，进奏院官吏要将京师动态和消息写成报告，寄或带给节度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方汉奇认为，这种报告，就是唐代的报纸。方汉奇先生通过对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的一份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实物分析，断定那份进奏院状，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报纸。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时的报纸不可能印刷，只能是手抄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说，唐代进奏院状是汉代邸报的翻版。

宋代社会鉴于唐朝的教训，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报纸的编辑发行由中央政府属下的都进奏院管辖，正如宋朝人赵升所说：邸报是由“门下后省编完，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²¹⁾据台湾新闻史学者朱传誉考证：宋代官方邸报基本上是每五天发行一次，既有手抄的，也有印刷的。

宋代不仅出现了官方邸报，而且还出现了民间私营“小报”。史载：“光宗绍熙4年（公元1193年）10月，臣僚言：朝报（即邸报）逐日自有门下后省定本，经由宰执始可执行。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是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²²⁾小报十分活跃，“日书一纸”几乎天天发行，深受朝野人士和市民的欢迎。然而，小报也引起了某些政府官员的不满，一个叫周麟之的人就写了一篇“论禁小报”的文章，攻击小报，说它“眩惑众听”（可见影响之大）、“无所不至”（可见传播之广）、“飞报远近”（可见消息之快）。⁽²³⁾宋朝历次皇帝对小报也异常恼火，屡次下令禁止，但始终是禁而不止。宋代小报在恶劣的社会环境里，一再地顽强地表现出它的原则和个性。总之，小报的诞生是古代新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打破了官报一统天下的新闻垄断局面，开辟了新的传播途径，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从许多宋代文献的记载看，有关新闻传播的一些词汇已成为当时人们的经常用语或习惯用语，如动辄就说什么“言语传播”、“欲以传播”、“传播中外”、“传播远弥”等等，这说明新闻传播的观念在宋代人的心目中，已占有一定的或相当的位置，在宋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新闻传播媒介的联系，已经越来越紧密。

五、简短的结论

事实上，唐宋以前的古代中国社会的传播活动要热烈得多、丰富的多，本文在这里所作的描述，不过是匆匆巡礼，勾勒出一幅粗线条的轮廓。其中笔者最关注的是报纸的诞生。

早期西方报纸通常产生在商业贸易中心，报纸刊登的消息决大部分与商业活动有关。而古代中国的报纸不同，它出生在皇室宫廷，或上层社会！报纸刊登的消息绝大部分是政治性新闻。无论是唐代的进奏院状，还是宋代的邸报；无论是官报，还是民报，它们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报纸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报纸最早在中国诞生，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智慧的结晶。然而，既然中国古代报纸先于西方早期报纸达数百年之久，为什么迟迟未能成为近代化型的报纸，反倒落后于西方了呢？这正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注：

1. 容庚：《金文编》
2. 《汉书·艺文志》
3. 《孟子·公孙丑》下篇
4. 《史记·苏秦列传》
5. 《太平御览》卷776
6. 7. 均见许慎：《说文解字》
8.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9. 《晏子春秋》
10. 戈公阵：《中国报学史》
11. 《后汉书·蔡邕传》
12.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3
13. 《宋会要辑稿》之51
14. 《宋史·食货志》下
15. 元微之：《元氏长庆集》卷51
16. 《全唐文》卷624
17. 《旧唐书·文宗本纪》
18.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2
19. 均见《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

20.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21. [宋]赵升：《朝野类要》卷4

22. 《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25

23. [宋]周麟之：《海陵集》卷3

（原载《走向未来》第3卷第2期）

文章管理: web@cddc.net (共计 2723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专栏：尹韵公

- 尹韵公：展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魅力 (2004-12-1)
- 谁在对谁行为？——跨文化传播的思考 (2004-10-25)
-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闻传播学研究——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 (2003-11-16)
- 论明代邸报的传递、发行和印刷 (2002-3-19)
- 尹韵公简介 (2002-3-19)

[>>更多](#)

相关文章：传播现象

- 对有“野人”说传播现象的剖析及反思 (2002-8-3)

[>>更多](#)

古代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先秦至唐宋 会员评论[共 0 篇]

我要评论

会员名

密码:

提交

重写

[关于CDDC](#) ◆ [联系CDDC](#) ◆ [投稿信箱](#) ◆ [会员注册](#) ◆ [版权声明](#) ◆ [隐私条款](#) ◆ [网站律师](#) ◆ [CDDC服务](#) ◆ [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